

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肖文奎

笔者已是耄耋之年，闲暇无事，对过去亲历、亲见的事一一进行了回顾，使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年代。当时我在城关公社工作，后调回周口店管理区。

当时，周口店地区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三风”，实行了“两化”，出现了“两减”。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行动军事化、农民吃饭食堂化；粮食减产、社员减收。

“共产风”：1958年不少人误认为实现了共产主义，过上了幸福生活，于是刮起了共产风，和其他地区一样兴起了“一平二调”的风暴（平均主义、无偿调拨）。村与村之间、队与队之间打破了界线，生产资料无偿调拨使用，社员的生活资料无偿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分给社员食堂使用。土地，村与村之间可以无偿调拨占用，离那村近就归那村耕种，还可在地上搞建筑。相互侵占的现象严重出现，周口村第一生产队从社员家无偿调出的大筐箩等生活资料又被第四食堂调走，社员把这种做法取名“刮旋风”，给后来的纠风工作增加了很大工作量。

共产风大大的伤害了社员的积极性，生产、生活资料受到了严重损失。有的社员把自家准备盖房的木料砸了当劈柴烧火或廉价卖掉，有的把自家做饭用的铁锅砸了卖废铁，每户只留吃饭用的碗筷。

“浮夸风”：提倡飞跃“快马加鞭，一日千里”当时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都怕被说成右倾保守，各行各业掀起了放卫星、创高产的高潮，谁都不甘落后。农村放卫星主要是粮食创高产，当时流传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干部要敢想、敢说、敢干，否则，不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就要被淘汰。在这样的误导下，农村出现了不顾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制订了生产计划和指导工作。村与村、队与队之间掀起了你追我赶报高产的生产竞赛高潮。竞赛中谁也不甘示弱，你亩产报八百，他就报一千，甚至超千斤的大话、空话现象。周口店公社是比较“保守”的，但在那种形势压力下仍出现了浮夸现象。当时全公社平均亩产300斤稍多点，在制订1959年生产计划时亩产还是报了千斤以上，谁要说亩产不能到千斤，就被说成是右倾保守，被定为辩论对象受到批评。原西庄村支部书记，1949年3月份入党，一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对上级党委分配的任务不讲条件，不打折扣。在制订1959年生产计划时，不愿脱离实际地说假话、大话，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思想，受到了批评。在形势的压力下，他违心的制订了亩产超千斤的计划指标，才算过了关。但这位支部书记的思想一直很沉闷，工作打不起精神，1961年公社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为他做了甄别工作，才

卸掉了思想包袱。

“瞎指挥风”：也叫强迫命令。当时各大队干部都怕被说成是右倾，于是，各种脱离实际地瞎指挥现象都涌现出来，归纳起来有四种；一是深翻土地。只讲深翻，不因地制宜，使土地表层受到破坏。秋播小麦时土地深翻要达到一米，否则就是不合格。周口村第一生产队在村西“轿杆地”组织全队劳动力，用铁锹深翻一米。这块土地的土层只有 50 多公分厚，土层下面是河卵石，村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运走了河卵石，再从别处运土回填，全队 100 多名劳动力，打着红旗，冒着严寒，干了一冬，这块五亩多地只翻了一半，结果是土地表层受到了破坏，第二年播种的大麦抽穗时全部倒伏，基本上没有收成。社员说：“这是瞎折腾劳民伤财”。二是密植不合理，盲目的追求密度，错误的认为越密越好。当时流传着株数越多，产量越高，有苗三分收，没苗难打粮的说法。小麦每亩播种量要求 150—200 斤，结果麦苗起身拔节时，通风差，光照不足，秸秆软，患锈病，又倒伏，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三是形式主义，缺乏科学性，不因地制宜。1959 年周口店公社制订生产计划时上级通知：京周公路两旁播种小麦，一律采取南北垅播种。理由是整齐、一致、好看，实际上这样做有很多弊病，不好耕地，土地不好平整，施肥浇水难度大，不利于小麦的日常管理，产量受影响，公社据实的反映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

“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为响应上级“赶英超英”的号召，原城关大公社成立了炼铁专业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土法上马在周口店村西（现在的京周公路西侧）建起了十几个土高炉，炉旁边安上小吹风机（俗称风葫芦）。每炉一个进行吹风，白天青烟遮日，夜里灯火通明，没有铁矿石就向各村分配上缴废铁任务，各村再向社员按人分配任务。为完成任务，不少社员把自家的铁锅、铁盆铁铤等砸碎上缴。不足部分再由各村将庙里的大钟，香炉砸碎了上缴，周口村砸了两口大钟，约 1.5 吨重完成了上缴任务。

“人海战术”：大轰大嗡，盛行人海战术，红旗飘扬。1958 年 11 月份一天晚上原城关大公社接县委夜里霜冻的通知。当时有一个村还有 100 多亩花生没收立即组织公社直属连 200 多名劳动力，打着红旗，连夜到该村帮着抢收，由于人多工具不足，不少人只得用手拔，仅用 4 个多小时 100 多亩花生全部收完，向上级作了汇报，受到了表扬。结果是大部分秧棵好的花生丢在地里，每株秧上只有几个没有仁的幼小嫩果（俗称老呱咀）。

“行动军事化”：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各生产大队改称连队，大队办公室改为连部，生产队改称排，取消了生产队名称，公社直属专业队改为连队设有连长、指导员、文书。各村以排为单位，凡在年龄的社员，（男 18 岁至 45 岁，女 18 岁至 40 岁）每天早晨一律出操跑步，未经批准不出操食堂不准发饭。曾出现不少有小孩的妇女因不出操跑步挨了饿，有的出操跑步小孩没人照看，得了感冒，社员对此做法非常不满意。

下地干活的各排以排为单位排着队下地，社员喊着“一二一”的口号走出村，

出村后再按工种分开干活，象起棚垫圈的活在村里，也要排队出村后再回劳动地点干活，往返浪费了不少时间。

村里召开社员会时，以排为单位，排长（生产队长）带领社员喊着“一二一”入场，哪排喊的整齐、响亮，受到表扬。反之，受到批评。

“社员吃饭食堂化”：进入了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大二公”很快出现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建起了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在本公社范围内干活或走亲访友，由食堂发给饭票，可在公社范围内任何一个食堂吃饭。本村社员食堂每户按人发给饭证，凭证到食堂领饭。食堂初期由于社员把粮食全部交到食堂，社员伙食很好，大米、白面随便吃，社员领饭不论大人小孩，一律按人分配，不少社员吃不了剩余部分到处乱扔，出现了严重浪费现象。好景不长，几个月的时间，食堂粮食吃光，加上粮食减产，社员每人每月仅吃原粮 30 斤，不足部分采取瓜菜代。把野菜、树叶和粮食掺在一起做成主食。到后来连玉米瓢子都用高温煮加上一定数量的火碱碾碎掺在粮食里一起做成主食，当时把它叫做淀粉。

食堂化后，社员的口粮全部由食堂安排，社员家里不再起火，来亲朋向食堂申请客饭，曾出现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如：社员不出勤食堂不给饭，开会不参加不给饭，不参加生产队组织的活动不给饭……。因当时物资紧缺，社员想买点副食是非常难的，只好饿着肚子。食堂也成了管制社员的工具，社员把食堂叫做治人堂。尽管食堂弊端很多，也不能说不好，否则，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受到批判。车场村大队的支部书记是一位退伍的二等残废军人，在部队曾多次立功，一贯拥护社会主义，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说了一句“食堂不如解散”，被定为对社会主义不满，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被批判了一天多，被迫违心的在会上做了检查，挫伤了他的积极性，直到 1961 年为他甄别后工作才主动起来。

“三风两化”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干部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处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状态。社员对集体经济不关心，不维护，干活出工不出力，见损害集体的行为两眼一合没看见或绕开走。下地干活锄地采取“你耨深、我耨浅，谁也拉不远。除草灭荒只耨地头，不管地里边。招玉米秸不带爹头（社员称牵笔杆），收花生用手拔秧，收麦子丢穗多等，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造成粮食减产，社员减收，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给国家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

“两减”给社员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吃粮标准降低，社员把食堂做的粥起名叫“电影粥”，意思是稀的能照见影子。有的村劳动日值（10 分）一角多钱，社员称之为“油饼队”劳动一年年终决算所剩无几，有的户还欠集体的。

1961 年中央及时颁布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下发了《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文件。

根据两个文件精神，各级党委认真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和浮夸风，解散了农村社员食堂，对调走的物资彻底进行了退赔。明确了公社和大队属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不得侵犯。恢复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建制，确定了以

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实行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社员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肖文奎：原周口店镇农机站站长